

当代儒学研究的经典诠释向度^{*}

景海峰

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呈现出各行其是、多元多样的景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多彩。从社会的广泛关注度和各行各业倾心相向的繁盛局面来看,这些研究的目标诉求和表达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资源的调动和学术运行的路径也是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有的重在思想义理,近于哲学,而学界主流仍是以历史研究为主调,重文献考据,也有些是致力于艺文创作或倡言实践,表现出比较强的现实性和大众化色彩。这些不同的取向以及致力各异的方式,所呈现出的儒学面貌是差异性极大的,甚至是互有抵牾、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要回到儒家的经典中去,以经典为依据来展开各式各样的理解与解释,以作为各自立场与独特诉求的合理性参照。这样,经典诠释就成为当代儒学研究中各种路径和方式的研究者们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也可以说是构成了所有研究活动之共有的基础,故称之为是当代儒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亦不为过。

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经典,这些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文献就不是过去的陈迹和一堆死材料,而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连续性累积和丰富多样性的记载,理解和解释它们,就需要当代人“精神的当下或在场”(伽达默尔语)通过对文本等历史传承物的解读和体会,使每个生命个体能够与过去的历史情景发生契合,以融贯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河之中。所以,任何具有深度的历史研究都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陈述历史事件,或者对已经存在的文本做白描式的展示,而是应该去努力发现其附属的一切意义,在极其有限的文字表达和浅显易知的表象背后,捕捉到更为深刻的含义,从而领悟人类精神活动的内涵与真谛。伽达默尔(H.-G. Gadamer)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①所以历史不仅是可叙述的对象,而且也是一个不断被重构的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凝固的历史。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儒家,我们对于它的历史理解,就更应该是如此。作为可做诠释的儒学史,能够准确地把握其内涵的基本中介物,便是历代儒家人物所留下来的著作,正是通过对这些文字的阅读和体会,通过一代代人不断的解读和阐释,我们才能与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发生交汇与碰撞。文字所记录和表达的意旨,正是在反复的阅读与叩问之中才能逐渐展现出来的,当下的理解对于凝固的文字来说便是一个不断打开的过程,阅读的意义就在于努力挑战与突破既有的表达形式,在连续性的视域融合之下,加入到“效果历史”生成的过程当中。与此观念相契合的是,当代儒学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机械历史观的羁绊,而更加注重于阅读者个人的体悟和理解,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体系与方法研究”(项目号:16AZX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上卷,第384—385页。

加关注儒学的活性与当下性的揭示。对于历代儒者所存留的文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早已经超越了历史文献学的心态,即不只是把它们看做是过去的遗产和僵死材料,而是可以不断叩问、可以与之交谈的心灵之友。儒学研究的这一诠释学转向,使得儒学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眼界和已有的框架之内,而是更多地包含了重构的意味,儒学研究也就不再仅仅是儒学史的研究,而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了可能的空间。

回到经典或者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儒学研究,除了传统的材料工夫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呈现经典的意义,把文本内容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历史上的这些留存物活化成为现实的思想动力。近十年来,从儒家经典中汲取营养,转化为面对当下问题的资凭,已经蔚成风气。从儒家经典出发,以经典诠释为中心成为了这类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经典的重新释读和不断阐释中,逼显出新的意义来,以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就学术形态和较具有规模的类型来看,这些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研究活动又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路径来。

一是新的经学研究。传统的经学在晚清已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科举制的废除在制度保障上瓦解了经学作为正统话语的基础,新学术系统的建立和教育体制的转换铲除了经学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给了经学最后一击,使得经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传统的经学消亡之后,作为经学的儒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哲学研究所取代,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变。这样一来,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便逐渐地归于销声匿迹;另一方面作为材料整理的经学史研究,也深受到现代学术理念的影响,并且处在极度边缘的状态。近些年来,随着儒学热潮的出现和研究范式的转变,经学史研究也呈现出了复兴的态势,一大批学者投身于经学史的研究当中。他们不满意于现代学术中经学史研究的衰败状况,对其颠覆与批判的基调和清理遗产的心态试图做出根本性的扭转,从而回到客观的、同情的理解,甚至稍许带有几分敬意的立场上来。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用传统的方式来治经,并且提出了回到经学去的种种设想;更有甚者,个别学者还以经学来否定现代学问的方式,以作全面抗衡乃至全盘置换之想。经学史研究的复兴和整体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现代学术中经学研究的颓势,也使得其学术位置有所变化,新的经学研究或“新经学”好像呼之欲出。但经学史研究的复盛局面,仍然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若是脱不开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被辖制在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则经典的现代意义难以彰显;若是完全复归于旧的经学形式,以乾嘉考据为蓝本,则这样的学术与现实之关联又越发的远离了,其意义究竟何在?所以到目前为止,新的经学之打造,究竟取何种姿态,将是一种怎样的面貌?仍然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的方式和形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中,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解体过程,伴随着西学的全面进入,特别是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原有的知识状况和学问方法已经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新的学术范式及其学科化的知识部类,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新形态逐步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场域,并且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关系,成为一切知识和学问的基础。传统资源的拣择、开发与再活化,就必须要以这种形态为前提。而在现代学术中,经学文本被重新配置和定位,拆解开来处理,化“六经”之内容于现代学术的分科部类之中,成为主流学界的普遍方式,也是以大学体制为代表的新学术的基本形态。在整体上,经学是作为现代新文化的对立面被颠覆和舍弃的,而转化之后的经学史研究,又受到了西学的刺激和影响,其重心是材料的整理,谈不上对现代价值的发挥。在这种局面下,这些碎片式的清理工作大多是放在历史学领域,或者在文献学的名目下进行,其现代式的学问面貌,已经与人生观、价值论这些内容没有关系了,不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只是纯粹的所

谓客观知识的探究而已,这就与经学的本质相去甚远。所以,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经典,或者要重构“新经学”,显然不是简单的复兴现代式的经学史研究,更不是要回到旧经学的形态中去,而是需要有一套新的思路和方法,也必须要有新的目标。就像《新经学》发刊词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经学绝非时下许多人宣称的,仅仅是可供驱谴的传统资源。经学是对经典视域的如实呈现,本身就是理解宇宙时空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维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学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①

二是古典学取径。传统的经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惨淡出局显然与西学的强势有关,对西学的全盘移植和过分依傍,使得中国现代学术不可能为经学保留地盘,没有对应的学科,也就失去了存身的空间。在现代化与传统学问的分割意识下,两者的对峙感愈形加剧,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离传统的经学形式越来越远。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经典,既然经学已逝,老路难再,那能不能就着现有的学术形态来寻找新的门径,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中找到一个整体性的解决办法,于是乎近些年来古典学的研究便随之兴起。与新的经学建构的主体意识不同,古典学的思路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普遍主义的色彩,其前提虽然立基于现代与传统的两分,但在总体上是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入手,试图在现代文化的形式中为古典学术的整体性保留一个有限的空间。古典学在欧洲的兴起,尽管可以将其萌芽及线索上追至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再发现、阿威罗伊主义这些内容讲起,但真正成型的学术形态、特别是作为学科形式的建制化,是要到19世纪的晚近才完成的。而这恰恰是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现代学科的形态完全成熟,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为引领的现代学术已经在某些方面略显疲态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古典学的扎稳脚跟就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与现代学术的分离及抗衡:一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特别是在精神向度上与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分道扬镳。二是通过对传统的回望与梳理,进而亲近传统、肯定传统,对宗教文化形态及其古典价值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容纳。三是由古希腊文明扩展至古埃及、近东文明、印度学,以至远东,打开了文化多样性的视野,可以说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铺垫和前奏。这些特征对于反思中国学术的现代化、重新理解古代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是打破科学主义对现代知识形态的笼罩状况,无疑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这些年来,有的学者借用古典学来解释“国学”,以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展开的说明,或者直接将中国传统学术以古典学来视之,做出层层转进之分析和阶段的区划,都是在有意无意间把这两者做了对等式的转换。但我们应该看到,欧洲的古典学叙事显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境况,它们的历史、背景和方法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将西方断裂式文明的再发现、然后经过重新塑造之后的模式,简单地移植到对于一个连续体的古代文明的描述方面,显然是不恰当的。当然,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理解,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紧张性,古典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学科板块的松动和位移,以及学术眼界和研究方法的重大变化,而这些都为儒家经典的重新理解和当代解释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三是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开展。围绕着经典诠释问题,近些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思潮当推解释学,而将诠释学原理运用到儒家经典的现代解释方面,则形成了儒家经典的诠释学探讨。目前大家十分关注经典诠释的问题,当然有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之刺激和影响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条路径显然和我们的特点有关,是向我们自身传统的回归,因为中国文化就是在漫长的经典解释的历史中不断地建构与重构的,也是在经典解释的积累和丰富化过程中得以延续的。如果离开了经

^① 邓秉元主编《新经学》(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典注释,包括儒家在内的这些思想就无法得以展示,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所以,回归自身的文化传统首先就是要回归其经典,即如何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面对这些经典、重新理解与解释这些经典,使这些经典的思想内容和我们当下的历史境遇与社会实践融会在一起,从而让这些伟大经典的生命力能够延续下去。从当下经典诠释的具体取径和儒家经典解释的现代理解来看,既有文献学的、方法论的,也有哲学体系创构的,其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难以做统一的概观。但作为整体性的儒家经典诠释学,其致力的要点和发展的方向又不外乎包含了以下的三个维度:一是对西方解释学的参照与理论上的吸收,这个背景,作为现代学术建设和文明间对话与会通的必备条件,是不可轻忽绕过或者置之不顾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二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着力开掘,特别是传统的经学资源的大量汲取,当然这是需要经过现代转化之后的新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复旧或者囫囵吞枣。三是有目标的整体性的哲学理解与学术建构活动,为儒学的现代转化与当代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为儒学的生命力书写新的时代证辞。^①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儒家经典诠释的理论建构意义,其不同于现代的文献学,也有别于新的经学形式,而是更为接近于哲学的形态。近百年来,儒学的哲学化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之后所选取的新的表达形式,伴随着现代性的成长,它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化,既融会了古今的各种元素,也吸收了中西文化交流所激荡而生的大量养分,成为儒学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的主要形式。在现代知识谱系中,哲学所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而是学习和评判如何做人,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一直保留下来。正是基于此,儒学在新时代的表达便选择了哲学,在哲学学科中,儒学的价值功能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它的众多思想资源也转化成了现代人精神的养料。儒学之归位于哲学,除了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谋得一合法性身份之外,哲学论域的宽广性和伸缩性也为儒学的存身空间和可能发挥提供了条件,可以使其话语有一个较为灵活的平台。从第一代新儒家人物开始,就在不断地调整面对特定时代的思路 and 方式,他们所做的转化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性工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向度,侧重点也不一样,但都是在以哲学的睿智和发掘义理的进路来诠释儒家的经典,讲出它们的新意来,将古典思想的养分汇聚到当下,把传统资源有效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当中,使之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的三种路径,都是围绕着经典诠释而展开的,构成了当代挖掘儒学资源、转化儒家思想、创造性地发展当代儒学的重要形式。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面对西方文化之强势以作调适的种种努力与方式上,可能有着相似的境遇和问题,故尔在内容和形式上多有重叠,有时并不能切割的十分清楚。其围绕着经典解释所展开的工作,又与既有的学科形式纠缠在一起,或者说离不开现有的学科背景与框架,因而运行的轨迹和操作的方法往往又似曾相识,以至于难以辨识其独特性。但放眼当代儒学发展的大势,尤其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回归趋向和儒学研究的独特意义及体系建构的迫切要求,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向度,其创造性的理论价值和另辟蹊径的光明前景,又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详见拙作《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载《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